

社會流動、社會網絡與工人意識*

黃毅志**

*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劃 (NSC 83-0301-H029-004) 的部份研究成果，特此致謝。同時感謝計劃主持人孫清山老師，兩位匿名評審委員，以及瞿海源、章英華、熊瑞梅、王振寰、林南五位老師的啓發與指正，以及研究過程中方孝鼎先生所提供建議。

** 台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中文摘要

雖然自馬克思以來，理論大師們對於社會流動如何影響到階級意識之發展，此即社會流動與階級形成的因果關係，已談得很多 (Goldthorpe, 1980)，有關社會流動，階級意識各別的經驗研究也都做了很多，但是對於兩者間的因果關係作嚴格檢證，特別是量化檢證的研究，卻做得不多。

本研究則依據民國 81 年社會變遷社會階層組資料，以多元迴歸與邏輯迴歸分析個人的階層流動經驗，如流動或不動，對於階級認同，與勞資對抗之意識，兩項不同層次的階級意識之影響，並探討在這個影響中，社會網絡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此外，本研究並進一步探究“是否各個客觀的階級（或階層）向度，對於階級意識之影響大小，會隨著層次不同而改變”的問題。

然而由於本研究所依據的社會變遷資料對於階級意識之測量，除了階級認同之外，都集中在“表現於對勞資對抗之態度”的工人意識，本研究對階級意識之探討乃以工人意識為焦點，這包含了工人認同與勞資對抗之意識；對社會網絡與階層經驗之探討，亦以“是否配偶或最好的朋友為工人”所代表的網絡特質，與“是否有處於工人階層的經驗”為焦點。

關鍵字：社會流動，社會網絡，工人意識

前言

雖然自馬克思以來，理論大師們對於社會流動如何影響到階級意識之發展，此即社會流動與階級形成的因果關係，已談得很多 (Goldthorpe, 1980)，有關社會流動，階級意識個別的經驗研究也都做了很多，但是對於兩者間的因果關係作嚴格檢證，特別是量化檢證的研究，卻做得不多。

本研究則依據民國 81 年社會變遷社會階層組資料，以多元迴歸與邏輯迴歸分析個人的階層流動經驗，如流動或不動，對於階級認同，與勞資對抗意識，兩項不同層次的階級意識之影響，並探討在這個影響中，社會網絡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此外，本研究並進一步探究“是否各個客觀的階級（或階層）向度，對於階級意識之影響大小，會隨著層次不同而改變”的問題。

然而由於本研究所依據的社會變遷資料對於階級意識之測量，除了階級認同之外，都集中在“表現於對勞資對抗之態度”的工人意識，本研究對階級意識之探討乃以工人意識為焦點，這包含了工人認同與勞資對抗之意識；對社會網絡與階層經驗之探討，亦以“是否配偶或最好的朋友為工人”所代表的網絡特質，與“是否有處於工人階層的經驗”為焦點。

一．文獻檢討

A. 社會流動、社會網絡與階級意識的關聯性

根據馬克思的論點，工人要起來行動，就必須要以發展出階級意識，也就是從佔有客觀階級位置的自在階級，發展成具有主觀階級意識的自為階級，此即階級形成，為先前條件 (Elster, 1986:

223-256, 王振寰, 1989:150)。Mann (1973) 指出發展成熟的階級意識包含四個要素，按發展的順序是：(1) 階級認同 (Class Identity)，如認同於工人階級；(2) 階級對抗 (Class Opposition)，如工人對抗資本主義及資本家；(3) 階級總體性 (Class totality)，指的是以階級的語詞來分析自己的處境與社會；(4) 一個替代社會 (alternative society) 的概念。有了階級認同，很可能僅涉及對階級分類及排列順序之認知，並不一定會具有對抗性意識；Giddens (1973) 也指出階級認同僅是最低層次的階級意識；然而正由於它的層次最低，它也是最根本的，是發展對抗性意識之前題；除非一個人有了階級認同，否則他不可能具有替代社會之概念，不可能有著革命的階級意識 (Vanneman, 1980；黃毅志, 1994)。

至於從自在階級發展成自為階級的先決條件，馬克思早就指出“階級不流動”是很重要的條件 (Goldthorpe, 1980:5)，隨後亦有許多理論大師們持著一樣觀點 (Dahrendorf, 1959:22; Lenski, 1966; Giddens, 1973; Parkin, 1979)；Giddens 就曾指出：階級不流動造成了代間共同生活經驗之傳承，而進了勞動市場後，侷限於報酬類似之職業的工作生涯，又強化了經驗的同質性，乃促成了可認同的階級之形成。Parkin 也指出流動模式 (pattern) 大大關連到階級行動與階級衝突，而流動模式是否具有開放性，下層階級，如工人，是否能排除障礙，而時有流入上層階級的機會，如變成資本家或專業人員，又取決於上下層階級間集體動員抗爭的結果 (Parkin, 1979; Goldthorpe, 1980:26)；而專業組織或工會為其成員爭取利益，設定資格，並排除不合格者進入組織，限制團體間的交換，以獨佔資源，又有助於內團體之形成 (Parkin, 1979)。Parkin 的理論已進一步論及了社會交換或網絡的封閉性有助於階級形成。

在 Giddens 和 Parkin 的理論架構引導下，Goldthorpe (1980) 所作的研究，則可以說是對於從社會流動（或不流動），到親密網絡之建立，進而促成階級形成整個因果過程作分析的階級形成研究之里程碑。Goldthorpe 把英國的階級結構分為工人階級，服務階級，與中間階級以進行分析，所得到的結論是：由於英國很早就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而工業化，英國的工人大都是好幾代之工人，這導致他們的親朋好友亦大多是工人，他們在工作生涯又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背景同質、網絡同質，加上工作生涯缺乏流動，也就造成了強大的工人階級之形成。相對而言，出身於任何階級者，一旦進了服務階級就能守在那裡，並在那裡廣結人際網絡，加上了工作生涯所具有的穩定性，也促進服務階級之形成。至於中間階級，則由於代間及工作生涯流動均大，也就難以產生階級認同（孫清山和黃毅志，1995b）。

Goldthorpe 的研究固然有著重大的貢獻，然而他並沒有對社會流動，親密網絡與階級形成的因果關係作嚴格的多變量檢證，相對而言，Hodge and Treiman (1968) 與 Davis and Robinson (1988), Baxter (1994)，則曾對這方面的因果關係作過多元迴歸之檢證；他們也都得到“個人的階級認同不但受到個人在客觀階級（階層）結構的位置所影響，亦受到他所認識的配偶、父母、親朋鄰居等親密網絡的階級位置之影響”的研究發現。然而在這些研究中，曾就流動對階級意識的影響作檢證的量化研究僅有 Davis and Robinson (1988)，他們以迴歸分析證實個人之背景，如是否 16 歲時父親擁有生產工具，會影響到他的階級認同。不過若依 Giddens (1973)，階級認同僅是最低層次的階級意識，是否網絡或流動變項也會影響到層次較高的階級意識，如對抗意識，仍有待於進一步之研究。

以上回顧了國外探討社會流動、社會網絡與階級意識的關聯性之理論與研究。相對而言，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做得很少，黃毅志(1994)的研究，則是國內少數曾用多元迴歸分析個人的客觀階層及網絡特質，與階級認同（分為上層階級、中上階級、中層階級、工人階級、下層階級）間的關連性者；他的主要結論是：台灣民衆階級認同不僅受到屬於個人特質的本人客觀階層位置之影響，亦受到屬於社會網絡特質的“配偶及父母現在的客觀階層位置”之影響。然而他的研究和上述國外的研究一樣：所分析的階級認同僅是最低層次的階級意識，而且又沒分析社會流動與階級意識的關聯性。今後國內的研究實有必要進一步分析社會流動、社會網絡與層次較高的階級意識，如對抗意識之關聯性，這也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然而在上述探討客觀的階級（或階層），及相關連的社會流動，親密網絡的階級位置，與階級意識之關聯性的國內外研究中，對於客觀的階級的向度之界定，有著很大的分歧性，這在下一節中將作檢討。

B. 客觀階級的向度之界定

馬克思在分析社會階層化時，把基於生產工具私有權的階級區分視為社會階層化的最主要面向。依馬克思的觀點，階級關係與生產方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性，在西方社會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下，小規模的生產方式無法與資本家的大規模生產方式競爭，因而小規模生產活動的老闆，即小資本階級，乃是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之產物，隨著資本主義制度之發展，小資本階級就會日漸淘汰。於是小資本階級乃為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所忽略，就馬克斯而言，生產關係將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分為資本家與工人兩大階級，而生產關係的基礎在於：

(1) 生產工具的私有權。資本家擁有生產工具，而沒有生產工具的工人必須向資本家出賣勞力，受到資本家的控制，不但在工作上失去自主性，而且受盡資本家的剝削，失去應得的財物。

(2) 爲了維持生產工具私有權而建立的種種與生產有關之社會關係。資本家爲了要維持他們的生產工具與累積財富，就建立了種種社會關係來保護他們的特權 (Elster, 1986)。

於是在馬克思理論中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具有生產工具的私有權，並藉此來控制工人的勞力，剝削工人，並累積財富，工人則受盡剝削而一無所有。基於生產工具私有權的階級區分就成爲了社會階層化的最主要面向，而馬克思在分析社會階層化時，乃專注於階級分析，並指出：唯有工人階級之形成，起來革命，推翻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制以建立社會主義，方能解除階級不平等的苦難。

然而由於本世紀以來，除了小資本階級仍然繼續生存，而不符合馬克思的預測之外，又有經理及專門技術人員之興起，使得社會分化日趨複雜，馬克思以“是否擁有生產工具”，來劃分資本家與工人兩大階級的單面向階層觀，已顯得過份狹隘 (Sorokin, 1927; Lipset and Bendix, 1959; Parkin, 1979)，因而有許多社會階層化的經驗研究者乃採取 Weber (1978) 的多面向階層觀，除了階級之外，職業也被視爲重要的階層面向。在 Blau and Duncan (1967) 的地位取得研究之典範下，職業被視爲最能代表客觀階層的單一指標；此外，教育與收入也被用來代表客觀的階級（或階層）。職業、教育與收入三者通常都被稱爲社經地位，在分析主觀的階級意識時，往往也被用來代表一個人的客觀的階級，衆多研究也都得到“社經地位提高，有助於提高階級認同”之發現 (Hodge and Treiman, 1968; Davis and Robinson, 1988; Baxter, 1994; Kelly and

Evans, 1995)。

固然許多研究者把職業視為最能代表客觀階層的指標，不過 Parkin (1979: 11-15) 卻又指出：固然不同的職業有著不同的生活機會，然而各個職業間的關係，並不像馬派所強調的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之分類般地呈現出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職業分類不容易如階級分類般地構成集體衝突的基礎，並顯現出“可能發生足以改變社會結構之集體對抗的界限”，此即階級界限。依他的觀點，是階級，而非職業，方能構成自為階級之基礎；即使職業流動具有封閉性，也不易從各個職業的基礎上發展出自為階級，從職業流動來分析階級界限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若要從流動的界限來分析階級界限，就當從階級流動之分析著手。

雖然階級流動的分析有其理論的重要意義，而不可忽略，然而由於本世紀以來，馬克思基於生產工具擁有權的單面向階級觀，已顯得過份狹隘，因而有許多階級分析者亦在生產關係的範圍裡，採取多面向階級觀，除了生產工具擁有權之外，許多與生產組織有關，並涉及剝削與被剝削問題之權力面相亦被納入分析。

馬克思學派的學者 Wright (Wright and Perrone, 1977; Wright, 1979) 後來把對於生產組織的擁有權與經營權，及資本主義簡單商品的生產方式所作的考量，都納入階級關係的測量基礎上。他基於本世紀以來生產組織的擁有權與經營權之分離，所導致的經理階級之興起，與小資本階級之繼續生存的事實，除了依據生產工具擁有權之外，並依據是否擁有購買他人勞力與控制他人勞力之權力，區分出四個階級（孫清山和黃毅志，1995a）：

1. 資本階級：擁有生產工具，並能購買他人勞力，控制他人勞力。
2. 小資本階級：擁有生產工具，但不能購買他人勞力，控制

他人勞力。

3. 經理階級：沒有生產工具，不能購買他人勞力，但能控制他人勞力。
4. 工人階級：沒有生產工具，不能購買他人勞力，控制他人勞力。

綜合以上各家說明，既然客觀的階級（或階層）涉及了許多重要面向，除了馬派基於生產關係的階級分類之外，職業、教育與收入等社經地位也是重要的面向，都有可能會影響到一個人的生活經驗與認知，以至於階級認同或有關勞資對抗的階級意識。本研究乃採取 Weber (1978) 及 Kelly and Evans (1995) 的多面向觀，分析各項客觀的階級，對於階級認同與對抗意識，兩項不同層次的階級意識之影響；本研究並進一步探究“是否各個客觀的階級，對於階級意識之影響大小，會隨著階級意識層次不同而改變”的問題，由於筆者所知道的既有理論，都還沒有對這個問題作過很清楚又很完整的說明，對此問題作探討，乃成爲本研究較具探索性的一面。

二．本研究之理論假設

根據前面的文獻回顧，本研究的主要一般性理論假設，可用因果模型表示（註1），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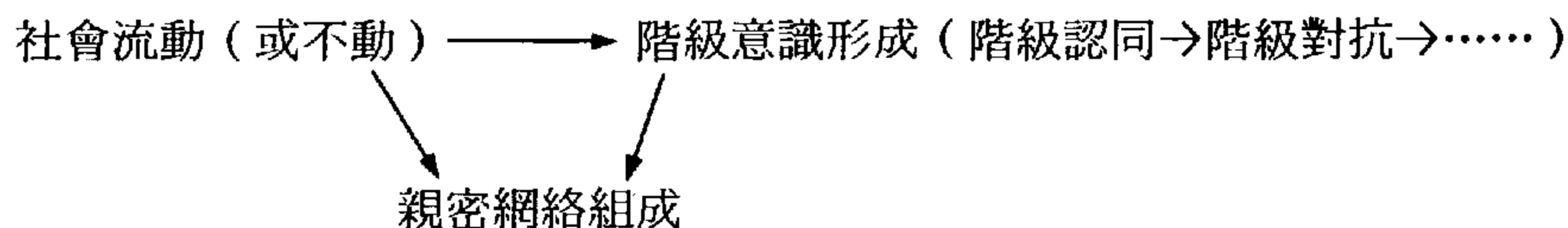


圖 1：階級形成因果模型

圖中社會流動透過對親密網絡之影響，而間接對階級意識之影響，可很清楚地從 Goldthorpe (1980) 之論述看出來；而直接影響當可從 Giddens(1973) 的“階級不流動造成了共同生活經驗之傳承……經驗的同質性，乃促成了可認同的階級之形成”看出來。圖中的階級意識還可更細緻的區分為階級認同，階級對抗等不同層次之階級意識，而低層次的階級認同為高層次階級意識形成之先決條件，這用因果過程的用語來說，階級認同發生在前，而關連到高層次的階級意識之發展，此即階級認同為高層次的階級意識之因。至於本研究這個因果模型的分析單位是個人，就 Giddens 的話來說，一個人從家庭背景，一直到整個工作生涯均為工人，自然很容易具有工人階級意識。

本研究除了針對以上主要理論假設作嚴格量化檢證之外，也要探討“是否各個面向客觀階級（或階層）位置與流動經驗，如職業或馬派的階級，對於階級意識之影響大小，會隨著階級意識之層次不同而改變”的問題；由於筆者至今還沒看到有任何理論或研究很完整地探討過這個問題，對此問題作量化經驗分析也就成了本研究較具探索性的一面。不過若依 Parkin (1979) 仍可預期：是馬派的階級，而非職業，才會影響到高層次的階級對抗意識之形成；至於各個面向的客觀階級對於低層次的階級認同，會有怎樣的的不同影響，卻仍不是很清楚，必須作過經驗分析後方能確定。再就 Parkin 的假設之檢證而言，由於至今還未看到有任何國內外研究曾作過嚴格的量化檢證，這項假設是否符合台灣社會，仍必須作過經驗檢證方能確定。

三、本研究所運用之方法

(一) 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分析的資料主要是：於民國 81 年進行調查的「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三次計劃社會階層組」資料，計劃主持人為瞿海源教授。這項調查以 20-64 歲民衆為對象，不但得全國性大樣本，而且針對社會階層問題作調查（瞿海源，1992），蒐集了許多有關社會流動、社會網絡與階級意識之變項；不過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是“台灣社會裡所發生的社會流動”對社會網絡與階級意識之影響，然而有許多不在台灣出生的樣本，這主要是隨著政府來台的外省人，他們的社會流動過程並不在台灣發生，因而在本研究所有的分析中，都剔除在台灣以外出生的樣本，而只針對「20～64 歲，而且在台灣出生的樣本」為分析對象。

(二) 變項測量

在以上階級形成因果模型的引導下，本研究以社會變遷資料對此因果模型作檢證。然而由於所分析的社會變遷資料對於階級意識之測量，除了階級認同之外，都集中在“表現於對勞資對抗之態度”的工人意識，本研究所作的分析乃把焦點擺在“工人”階級形成之因果過程上，對於社會網絡與階層經驗之測量，亦以“能有效區分是否配偶或最好的朋友為工人，是否有處於工人階層的經驗”為焦點。至於本研究所用到的變項之測量方式，則如下述：

1. 階級認同：問卷以“如果社會可分為上層階級、中上層階

級、中層階級、中下層階級、工人階級、下層階級，你認為你是那一個階級？”來對受訪者的階級認同作測量，這與 Davis and Robinson 及 Hodge and Treiman 的問法類似。本研究在檢證因果模型時，把焦點擺在成“工人”階級之形成，也就把階級認同二分爲工人階級與非工人階級（含上層階級等其它五個階級）。

關於這項階級認同的測量，或許可質疑臺灣民衆根本心中無階級，問他們的階級認同根本沒意義。不過若依吳乃德(1992)：有八成的臺灣民衆認爲臺灣有階級存在，這些民衆又有八成認爲自己屬於其中某一個階級，民衆似乎普遍性地以階級的語言來建構他們的社會認同；吳乃德又指出：即使強迫性地以問卷詢問這少數心中無階級的臺灣民衆之階級認同，他們仍可能依其社會地位或生活處境選擇他們的階級認同，當社會矛盾趨尖銳時，這項認同就會顯現出來，這種強迫性地問卷詢問仍有其意義（黃毅志，1994）。

細心的讀者尚可繼續質疑本研究的階級認同測量不但包含了上層階級、中上層階級、中層階級、中下層階級，以及下層階級共五項屬於順序性測量的選項，同時又包含了工人階級此一深具對抗意涵的類別性選項，如此摻雜的階級認同測量背後的邏輯究竟是甚麼？依筆者的觀點，每一個人都可具備了多項認同，如同時認同於男性、外省人、工人階級……；也可同時認同於許多階級，如同時認同於中下階級，以及工人階級，可說自己屬於中下階級，也可說屬於工人階級。很可能台灣的民衆不但能以“上層階級、中上層階級、中層階級、中下層階級，以及下層階級”的順序性社會階級觀來劃分階級，同時也能以“是否爲工人（乃至於是否爲資本家）”此一具有對抗意涵的類別性階級觀來劃分階級（參吳乃德，1992:12，表二）；當他們面對本研究的階級認同

之選項時，較傾向於順序性階級觀之民衆，即使也能認同於工人階級，仍會選擇上層階級、中上層階級……等順序性階級中的一項，較傾向於類別性階級觀的認同於工人階級之民衆，才會選擇工人階級。這也就是說選擇工人階級者，當較傾向於具有可能發展出對抗意識的“是否為工人”之類別性階級觀，很可能具有強烈的工人意識，而選擇順序性階級而非工人階級者，當較傾向於具有順序性的階級觀，即使也能認同於工人階級，也不易有明顯的工人意識；依此階級認同測量作分析，並把認同二分為工人階級與非工人階級，仍具有分析的實效。

雖然本研究的階級認同測量仍具分析的實效，往後的研究仍應對於民衆可能具有的多項階級認同個別作測量，不但以純粹順序性的階級選項“上層階級、中上層階級、中層階級、中下層階級，以及下層階級”，讓民衆作選擇，另外也以類別性的“工人階級（或黑手）、資本家、小資本家（或頭家）……”，讓民衆作選擇（參謝國雄，1989），力求更精緻的測量與分析。

2. 對勞資抗爭之態度：這代表著層次較高的階級對抗之工人階級意識，以受訪者對下列問題的看法作測量：

- (1) 員工無故被開除，經溝通協調也沒效，其它員工應抗爭之程度。
- (2) 員工遭上級不當處分，經溝通協調也沒效，其它員工應抗爭之程度。
- (3) 您是否同意員工罷工或停工。
- (4) 您是否同意員工經合法程序票決而罷工。
- (5) 工人在不滿工作條件與工資所進行的罷工中，所提出的要求當得到的滿足程度。

在作因素分析時，必須根據受訪者對上列問題的看法給定數

值，就(3)(4)而言，本研究給很不同意者為1，不同意2，無意見3，同意4，很同意5；數值越高，代表越同意。就(1)(2)而言，回答當事人自行處理者給1，繼續溝通2，書面申訴3，提出抗議4；數值越高，代表所支持的抗爭程度越強。就(5)而言，回答工人當沒得到任何滿足者給1；滿足很少，讓步很多者給2；滿足很多，讓步很少者給3；滿足大部份者給4；數值越高，代表受訪者認為工人當得到的滿足程度越高。

3. 階層態度；以受訪者對下列問題的看法作測量：

- (1) 政府應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
- (2) 政府應保障每個人最低的收入。
- (3) 政府應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補助。
- (4) 政府應提供窮人子弟更多進大學的機會。
- (5) 讓企業有好的利潤是改進社會大眾生活的最好方法。
- (6) 大企業在目前台灣社會的“社會”勢力太大。
- (7) 大企業在目前台灣社會的“經濟”勢力太大。

這些階層態度都與上下階層間的再分配問題有關，雖然不一定能用來測量階級對抗之意識，然而也和對抗意識一樣，都涉及上下階層間權益再分配之問題，本研究也要分析客觀階級變項與這些階層態度之關連；然而在作因素分析時，仍必須根據受訪者對上列問題的看法給定數值，本研究乃給很不贊成者為1，不贊成2，無意見3，贊成4，很贊成5，數值越高，代表越贊成。

4. 本人教育：以所接受的學校正式教育年數作測量（註2）。

5. 職業：把十五歲時父親職業、本人初職、現職、最好的朋友或配偶現職，都分成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買賣服務工作人員、勞動工人、以及農林漁牧獵人員四類階層由高至低的職業（參孫清

山和黃毅志，1995b），在作邏輯迴歸或迴歸分析時，依此做三個虛擬變項，以對最好的朋友，配偶現職是否為工人或是否具有工人階級意識作預測。

6. 收入：根據“個人工作每月收入”作測量，嚴格而言屬於等級尺度（可參見該調查問卷），數值越大代表收入越高。

7. 馬派階級位置：參考 Wright and Perrone (1977) 的階級分類，根據問卷上是否為自己工作，是否有僱人，以及是否為家裏工作三項指標，來界定受訪者父親與本人的初階級位置，可把受訪者父親與本人區分為四種客觀階級位置：資本家，為自己工作且僱人；小資本家，為自己工作但沒僱人；經理或工人，即不為自己或家裏工作，且沒僱人之受僱者；家屬工作者，為家裏工作；在作邏輯迴歸或迴歸分析時，依此做三虛擬變項，以對階級意識作預測。

若依 Wright，還可根據“是否控制他人勞力”對受僱者做區分：以控制他人勞力的受僱者為經理，不能控制他人勞力的為工人；然而由於本研究欠缺父親、本人初階級位置“是否控制他人勞力”之資料，不能作此細分。本人現階級位置則多出“是否控制他人勞力（管理其他員工）”的測量，一共有四個指標藉以代表本人之階級位置，可將本人階級位置區分為資本家、小資本家、經理、工人及家屬工作者；在作邏輯迴歸或迴歸時，依此做四個虛擬變項，以對階級意識作預測。

由於有些台灣民衆為家裏工作，他們即家屬工作者，他們的階級位置究竟如何，一直都沒看到國內外的階級分析者，如參考書目上的作者，對此作清楚的說明，在本研究中，乃把他們獨立成一類，藉此可分析他們的階級意識是否與其它階級者有所差別。

8. 性別：在做迴歸時做虛擬變項，以男性為0，女性為1。

9. 出生年次：以受訪者所回答的民國出生年次作測量。

10. 都市化程度：以受訪者現工作地都市化程度為指標，並根據行政院主計處(1983)的「中華民國統計地區標準分類」，把都市化程度分成1-8共八個等級，數值越高代表都市化程度越高。若依瞿海源(1994)，可預期都市化程度越高，則對社會問題，如不平等問題越具敏感度，而影響到階層態度。

(三) 分析方法

本研究在圖1階級形成因果模型的引導下作量化分析，並檢證相關理論假設，可說是參照了路徑分析的分析架構。本研究所運用的分析方法包括了雙變項百分比交叉分析，迴歸與邏輯迴歸分析，以及因素分析。首先以雙變項百分比交叉分析來說明現階級、現職業位置與階級認同、階層態度、勞資態度之關連；然而這些百分比交叉分析，無法控制教育、收入、性別、網絡特質、過去的階級、職業經驗……，以分析現職業、現階級的淨影響；隨後的迴歸與邏輯迴歸分析除了要控制眾多變項以分析現職業、現階級之影響外，亦要進一步說明這些所控制變項之個別影響，並檢證因果模型所涉及的相關理論假設。在隨後的迴歸分析中，由於涉及了眾多有關勞資抗爭態度、階層態度之依變項，乃先透過因素分析以縮減依變項的個數，得到更抽象的概念，以簡化進一步的迴歸分析。這些因素分析，除了有簡化的迴歸分析的作用之外，用來釐清各項勞資抗爭態度、階層態度變項所測的是什麼亦是目的。

四、研究發現與解釋

(一) 百分比交叉分析

本節以百分比交叉表分析本人現職業與現階級位置兩個客觀階層變項，與主觀階級認同，對勞資抗爭之態度，以及相關的階層態度之關連性。

從表 1 列百分比可看到現階級位置以工人，認同於工人階級的比率最高，達 36.5%，此現階級為工人者中，還包含了許多非管理職務的白領受雇者（表略）；小資本家次之，亦達 34.8%；資本家亦有 19.0% 認同於工人階級，依先前的研究（謝國雄，1989；黃毅志，1994），不但沒僱用員工的小資本家，要像工人般地辛勤工作，台灣的資本家亦大多為小雇主，也要像工人般辛勤工作，這當為許多資本家、小資本家認同於工人階級的重要原因。現為經理者認同工人階級的比率為各階級中最低者，而有最高的比率認同於較高層的中上層級與中層階級。不論現為任何階級位置，幾乎都以認同於中層階級的比率最高，現為工人者認同於中層階級的比率（38.5%），尚高於認同工人階級的比率（36.5%），這可反映出，包括工人在內的多數民衆都有著“有層級高低之分的順序性社會階級觀”，而較少數的民衆具有比較可能發展出對抗意識的“是否為工人”的類別性階級觀。

從表 1 行百分比又可看到認同於工人階級的受訪者中，以現為工人者佔大多數（58.4%），亦有不少的比率為小資本家與資本家（共佔 29.3%）。

表 1：客觀階層變項與階級認同關連性百分比交叉表

階級認同

卡方檢定 P=.00 Cramer's V= .15

列百分比 行百分比	上層 階級	中上層 階級	中層 階級	中下層 階級	工人 階級	下層 階級	Row Total
資本家	.7 9.1	14.1 14.4	51.4 10.9	12.0 8.0	19.0 5.5	2.8 3.4	142 8.7
小資本家	.6 18.2	3.6 8.6	32.7 16.3	15.3 24.1	34.8 23.8	12.9 37.1	333 20.4
經理	.5 9.1	15.3 24.5	54.5 18.1	16.2 17.0	11.7 5.3	1.8 3.4	222 13.6
工人	.6 45.5	7.9 44.6	38.5 45.0	11.0 40.6	36.5 58.4	5.4 36.2	780 47.8
家屬工作者	1.3 18.2	7.1 7.9	41.0 9.6	14.1 10.4	21.8 7.0	14.7 19.8	156 9.6
Column Total	11 .7	139 8.5	667 40.8	212 13.0	488 29.9	116 7.1	1633 100.0

階級認同

卡方檢定 P=.00 Cramer's V= .29

現職業	上層 階級	中上層 階級	中層 階級	中下層 階級	工人 階級	下層 階級	Row Total
專技管理 佐理人員	.9 41.7	17.5 69.9	54.7 44.9	12.6 32.2	13.2 14.2	1.1 5.0	532 33.0
買賣, 服務 工作人員	.6 16.7	5.2 14.3	45.9 25.6	17.7 30.8	24.9 18.3	5.8 17.6	362 22.4
勞動工人	.4 16.7	2.4 9.0	26.9 20.7	10.2 24.5	52.6 53.1	7.4 31.1	498 30.9
農林漁牧 獵人員	1.4 25.0	4.1 6.8	25.8 8.8	11.8 12.5	32.1 14.4	24.9 46.2	221 13.7
Column Total	12 .7	133 8.2	648 40.2	208 12.9	493 30.6	119 7.4	1613 100.0

接著分析現職業與階級認同的關連性。先就列百分比作分析，各現職者以勞動工人，即所謂的藍領工作者，認同於工人階級的比率最高達 52.6%，其餘依次為農林漁牧獵人員（32.1%），買賣服務工作人員（24.9%），專技管理佐理人員比率最低，僅 13.2%。不論是現職業為何，都有很高的比率認同於中層階級，特別是專技管理佐理人員（54.7%）與買賣服務工作人員（45.9%），並有許多勞動工人（26.9%）認同於中層階級，而不認同於工人階級。再就行百分比作說明，認同於工人階級者有半數（53.1%）為勞動工人。

再就代表雙變項關連性的 (Cramer's V) 而言，現職業與階級認同的關連性 ($V=.29$)，要比現階級位置與階級認同的關連性 ($V=.15$) 高出不少；各現職業者認同工人階級的比率之差異，亦要比各現階級者認同於工人階級的比率之差異要大得多；就雙變項百分比交叉分析而言，現職業與階級認同的關連，要比馬派的現階級位置之關連為大。

接著說明各現職業、各現階級位置與對勞資抗爭的態度之關連性（表繁從略）。各現職業、現階級與五項勞資抗爭態度的關連性 (Cramer's V) 都很小，V 值最大不過 0.10，然而仍有幾點值得說明：

(1)固然不論現階級為資本家、小資本家、經理、工人或家屬工作者，大都覺得“工人在不滿工作條件與工資所進行的罷工中，所提出的要求當得到的滿足程度”應是“滿足一些，讓步一些”，而且階級與“應滿足的程度”可說是沒有關連 ($V=0.04, P=.78$)，工人並不比其他階級者更覺得工人應得到較多滿足，看不出有特殊的工人意識。然而工人同意“員工罷工或停工”，“經合法程序票決而罷工”，與支持“員工無故被開除”或“遭上級不

當處分經溝通協調也沒效“其他員工應抗爭之程度，均遠高於資本家；經理對這些罷工、員工抗爭項目的同意或支持程度都高於資本家，而與工人相近；小資本家對上述罷工項目的同意程度則介於資本家與工人中間，然而對員工抗爭的支持程度卻與工人相近；家屬工作者對各項罷工、抗爭的同意或支持程度，則都與資本家相近（以上現階級與這四項有關罷工、抗爭態度變項關連的P值均小於0.05）。

(2)現職業為專技管理佐理人員同意或很同意各項罷工的程
度，認為該以書面抗議或提出抗議進行抗爭的比率均為四項職業
中最高者，並有職業階層越高，贊成書面申訴的比率越高之現象；
勞動工人對於罷工、抗爭的同意或支持程度並不比整體民衆
為高，並沒顯現出獨特的工人對抗性階級意識（以上現職業與這
四項有關罷工、抗爭態度變項關連的P值均小於0.05）。

至於現階級位置，職業與七項涉及再分配的階層態度之關連
性（表繁從略），所有的關連性都不是很強，Cramer's V最大亦
不過.13，在有效樣本均都相當大（均超過1500）的情況下，仍有
許多關連性未達統計顯著（ $p > 0.05$ ），然而仍有幾點值得說
明：

(1)不論現階級位置是資本家、小資本家、經理、工人或家屬
工作者，大都贊成或很贊成目前台灣社會的大企業的“經濟”與
“社會”的勢力太大，其中又以經理贊成或很贊成的比率最高，
資本家居次，贊成或很贊成“經濟”與“社會”勢力太大的比率
均超過七成；台灣的資本家大都為小雇主，經營中小企業，擔心
大企業的威脅當為重要原因（以上現階級與贊成“經濟”與“社
會”勢力太大的關連P值均小於0.05）。

(2)資本家贊成或很贊成政府應“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

需補助”，“保障每個人最低的收入”的比率均為各階級中最低者（以上現階級與這兩個階層態度的關連 p 值均小於 0.05）。

(3) 有著現職業階層越高，越贊成大企業的“經濟與社會的勢力太大”，越不贊成“政府應提供窮人子弟更多進大學機會”的現象（以上 $p < 0.05$ ）。

（二）因素分析

本研究對五個有關對於勞資抗爭之態度做因素分析時，先以主成份分析抽取因素（取 λ 值大於 1），再以 Oblimin 進行斜交旋轉，得到兩個因素（參表 2）；因素一可命名為對罷工之支持程度；因素二可命名為對不當處分進行抗爭之支持程度。兩個因素間之相關 $r = 0.15$ ；兩個因素總共能解釋五個觀察變項變異之 59.6%。

表 2：台灣地區民眾對勞資抗爭之態度因素分析 (Pattern Matrix):

	因素一	因素二
員工無故被開除，經溝通協調也沒效，其它員工應抗爭之程度	.86252	-.00024
員工遭上級不當處分，經溝通協調也沒效，其它員工應抗爭之程度	.86166	.01238
您是否同意員工罷工或停工	.04148	.79665
您是否同意員工經合法程序票決而罷工	.18383	.74764
工人在不滿工作條件與工資所進行的罷工中，所提出的要求當應達到的滿足程度	-.10092	.46062

本研究並對七個有關階層態度之變項做因素分析，先以主成份分析抽取因素（取 λ 值大於1），再以 Oblimin 進行斜交旋轉，得到兩個因素（參表3）；因素一可命名為保障貧困者之心態；因素二可命名為壓抑大企業之心態。兩個因素間之相關 $r = -0.01$ ；兩個因素總共能解釋七個觀察變項變異之 52.2 %。

表 3：台灣地區民眾的階層態度因素分析 (Pattern Matrix):

	因素一	因素二
政府應讓每個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	.70555	.06558
政府應保障每個人最低的收入	.69947	.03390
政府應提供失業者維持最低生活所需補助	.68761	.01725
政府應提供窮人子弟更多進大學的機會	.68573	.10571
讓企業有好的利潤是改進社會大眾生活的最好方法	.33450	-.19046
大企業在目前台灣社會的“社會”勢力太大	.01559	.88485
大企業在目前台灣社會的“經濟”勢力太大	.06887	.87867

(三) 邏輯迴歸分析與迴歸分析

從表 4 的邏輯迴歸分析可看到對於受訪者“最好的朋友為勞動工人”的機率影響達到顯著 ($p < 0.05$) 的變項有女性、出生年次、教育年數，父職為勞動工人，農林漁牧獵工作者，初職為勞

動工人，與現職為勞動工人；表 4 中的 R 相當於迴歸之 β （參 SPSS Inc. 1990:B-42），可看到影響最大的變項為現為勞動工人 ($R=.22$)，其次為教育年數 ($R=-.12$)。即使同樣現為勞動工人，女性、高教育程度者，出生年次較低而年齡較大者，較不可能以勞動工人為最好的朋友；可能的原因是：女性、高教育者、出生年次較低者本身即為勞動工人的機率較低（表略），在具有同質性的擇友過程中，他們傾向於選擇同質性的女性、高教育者、或年次較低者，而這些被選擇的對象少為勞動工人，自然降低最好的朋友為勞動工人之機會。即使同樣現職為勞動工人，具有父職，初職為工人的經驗之不流動者，最好的朋友為工人的機率較高；如果一個人的父職、初職、現職均為勞動工人，則有最大的機率以勞動工人為最好的朋友，支持了流動（或不動）的經驗會影響親密網絡的理論假設。

接著分析影響受訪者“配偶為勞動工人的機率”之因素。影響達到顯著的變項有出生年次、教育年數，現職為勞動工人、現職為農林漁牧獵工作者。出生年次較低的高年齡者，教育年數較高者，較不可能以工人為配偶，這可用婚姻配對之同質性來解釋：他們傾向於和很少是工人的高年齡、高教育者結婚，降低了以工人為配偶的機率。現為勞動工人者，較可能以工人為配偶，初職為勞動工人，父親為勞動工人亦較可能以工人為配偶，階層經驗一直為勞動工人的不流動者，最可能以工人為配偶，而符合理論的預期；然而後兩者的影響未達顯著，重要的原因是：限於對已結婚的樣本作分析，降低了樣本數。現為農林漁牧獵者降低了配偶為勞動工人之機會，原因是：農民有高度的傾向以農民為配偶（孫清山和黃毅志，1995b），降低了以勞動工人為配偶的機會。

表 4：親密網絡與工人認同邏輯迴歸分析

	最好的朋友 為勞動工人(1)		配偶為 勞動工人(2)		本人認同於 工人階級(3)		本人認同於 工人階級(4)	
女性	b=-.45* R=-.05		-.08 .00		-.78* -.11		-.79* -.10	
出生年次	.04*	.09	.04*	.09	.01	.00	.00	.00
教育年數	-.16*	-.12	-.20*	-.17	-.05	-.02	-.01	.00
父階級為小資本家					.40	.00	.82	.03
父為工人或經理					.33	.00	.48	.00
父為家屬工作者					.18	.00	.66	.00
父職為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44	.00	.55	.00	.40	.00	-.31	.00
父為勞動工人	.67*	.04	.32	.00	.19	.00	-.01	.00
父為農林漁牧獵工作者	.83*	.06	.50	.00	.24	.00	-.14	.00
本人初為小資本家					.02	.00		
初為工人或經理					.22	.00		
初為家屬工作者					-.04	.00		
初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44	.00	.28	.00	.47	.01	.67	.01
初為勞動工人	.85*	.06	.44	.00	.63*	.11	.38	.00
初為農林漁牧獵工作者	.01	.00	-.59	.00	.76	.03	.03	.00
現為小資本家					.55	.02	2.2*	.09
現為經理					-.37	.00	1.1	.00
現為工人					.39	.00	1.4	.05
現為家屬工作者					-.03	.00	1.8*	.06
現為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31	.00	.28	.00	.17	.00	.45	.00
現為勞動工人	2.5*	.22	1.02*	.09	1.2*	.11	1.4*	.11
現為農林漁牧獵工作者	.31	.00	-1.5*	-.08	.11	.00	-.40	.00
現收入					-.22	-.09	-.32	-.11
最好的朋友為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14	.00	.06	.00
最好的朋友為勞動工人					.18	.00	.14	.00
最好的朋友為農林漁牧獵工作者					-.32	.00	-.60	.00
配偶為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38	.00
配偶為勞動工人							.27	.00
配偶為農林漁牧獵工作者							.32	.00
常數：N	-3.1*	1184	-1.4*	683	-.87	1159	-.59	525
Model χ^2 (df) P	498(12)	.00	207(12)	.00	265(26)	.00	127(29)	.00

說明：* 表 $P < 0.05$

以上的分析大致支持了是否具有工人階層的經驗，是否不曾有過流動，會影響到是否親密網絡中，最好的朋友、配偶為工人的機率。以下進一步檢證“親密網絡與階層經驗會影響到階級意識”的假設。

從表4方程式(3)可看到，對本人認同於工人階級的影響達到顯著的變項有女性，初職為勞動工人，現職為勞動工人，現收入女性認同於工人階級的機率低於男性可歸因於：有許多女性認同於順序性的中層階級，降低了認同於工人的機率（表略）；收入越高認同於工人階級的機率越低，原因是許多高收入者傾向認同於層級較高的中層、中上層與上層階級（表略）。現職為工人，初職為工人者，有較高的機會認同於工人階級，如果一個人一直為處於勞動工人的不流動狀況，則很可能有最大的機會認同於工人階級，證實了流動或不動的階層經驗會影響階級意識的假設；父為勞動工人，對於認同於工人的影響雖未達到顯著，然而b值為正，仍符合假設（註3）。然而在控制現職、收入後，現為工人階級對認同於工人的影響卻未達顯著，這可反映出台灣的民衆對於“工人”之界定，是以職業類別，而非以馬派的“是否擁有生產工具”、“是否管理員工”為準。比較令人感到訝異的是用來代表親密網絡特質之最好的朋友現職，對於“認同於工人”之影響未達顯著，而不合假設。

方程式(4)從(3)加入配偶職業變項，樣本乃限於已結婚者，原有變項的影響大致不變，新加入用來代表親密網絡特質的配偶職業之影響仍未達顯著，此又不合假設；然而方程式(4)並沒把初階級位置納入分析，原因是：先前的分析曾顯示：把初階級位置納入分析，就會發生嚴重的 Multicollinearity 之問題；方程式(4)中原有變項的影響改變較大，而必須作進一步說明的是：

1. 現為小資本家，家屬工作者比起資本家，有較高的機會認同於工人階級（ $p < 0.05$ ），這有可能是沒把初階級位置納入分析，所導致的模式認定錯誤 (Model Misspecification) 所致 (Wonnacott and Wonnacott: 1979: 413-419)，不宜作過度的解釋。

2. 初職為勞動工人之影響變得不顯著，這除了模式認定的問題之外，樣本變小了也是重要原因。

在上述以邏輯迴歸分析過階層經驗，親密網絡對於最低層次的階級意識“階級認同”之影響後，接著以迴歸分析階層經驗，親密網絡對屬於較高層次的抗爭性階級意識之“對於勞資抗爭之態度”，與相關連的“壓抑大企業之心態”，“保障貧困者之心態”等階層態度之影響。由於在所作過的分析中，親密網絡變項的影響均未達統計顯著，本研究在表 5 中，乃把親密網絡變項剔除於迴歸模型再作參數估計。

從表 5 可看到身為女性降低對不當處份所進行的抗爭之支持，出生年次較高者則較支持抗爭（以上 $p < 0.05$ ），父職、父階級、初職與初階級，現職對抗爭的支持程度之影響均未達顯著，然而現階級的影響較為明顯，現為小資本家，工人的支持程度都顯著高於資本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認同於工人階級者和職業為勞動工人者一樣，都不會提高對抗爭的支持程度。在表 5 中，已將工人階級認同納入分析，職業為勞動工人對抗爭的支持程度之影響，就不包含透對階級認同之影響而對抗爭支持程度之間接影響（可參圖 1），而僅為直接影響；然而直接影響並不顯著，階級認同的影響亦不顯著而不能顯示出間接影響，也就完全無法顯示出職業為勞動工人對抗爭的支持程度之影響。

影響“對罷工之支持程度”達到顯著的有教育年數越高越支持，父職為買賣服務工作人員、農林漁牧獵工作者及現階級為工

表 5：勞資態度與階層態度迴歸分析

	對抗爭之 支持程度		對罷工之 支持程度		保障貧困者 之心態		壓抑大企業 之心態	
女性	$\beta = -.19^*$	$\beta = -.10$.04	.02	.13	.06	-.22*	-.11
出生年次	.009*	.09	.006	.06	-.006	-.06	.00	.01
教育年數	.01	.07	.04*	.16	-.02	-.07	.03*	.14
父階級為小資本家	.16	.08	-.02	-.01	-.06	-.03	-.22	-.06
父為工人或經理	.03	.01	.11	.05	-.11	-.05	.01	.01
父為家屬工作者	.06	.01	-.09	-.02	-.06	-.01	-.12	-.04
父職為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16	-.03	.31*	.12	-.01	.00	.02	.01
父為勞動工人	-.07	-.03	.14	.06	-.03	-.01	.01	.00
父為農林漁牧獵工作者	-.14	-.07	.25*	.12	-.05	-.02	-.03	-.01
本人初為小資本家	.00	.00	-.06	-.02	-.55*	-.16	-.04	-.02
初為工人或經理	.24	.10	-.10	-.04	-.24	-.10	.01	.01
初為家屬工作者	.43	.13	-.22	-.06	-.24	-.07	-.12	-.04
初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13	-.05	-.03	-.01	-.06	-.02	-.10	-.03
初為勞動工人	-.05	-.03	-.07	-.03	-.10	-.05	-.13	-.06
初為農林漁牧獵工作者	.14	.05	.21	.07	.09	.03	.13	.04
現為小資本家	.38*	.15	.24	.09	.38*	.15	.17	.07
現為經理	.23	.08	.09	.03	.22	.08	-.07	-.03
現為工人	.24*	.12	.26*	.12	.31*	.16	-.04	-.02
現為家屬工作者	.05	.01	.11	.03	.22	.06	.03	.01
現為買賣服務工作人員	-.04	-.01	-.06	-.02	.01	.00	-.25*	-.10
現為勞動工人	-.08	-.03	.12	.05	.14	.06	-.12	-.05
現為農林漁牧獵工作者	.05	.02	-.02	-.01	-.08	-.03	-.04	-.01
現收入	.02	.05	-.01	-.03	-.01	-.02	.00	.00
現工作地都市化程度	.01	.02	.01	.02	-.04*	-.08	.05*	.10
認同於工人階級	-.07	-.03	.05	.02	-.07	-.03	-.11	-.05
常數	-.59*		-.10*		.57		.01	
N	1149		1149		1202		1202	
R ²	.06		.05		.05		.08	

說明：* 表 $p < 0.05$

人傾向於持罷工；認同於工人階級者和職業為勞動工人一樣，影響仍然均未達顯著，仍然無法顯示出職業為勞動工人對罷工之支持程度之影響。

再就影響“保障貧困者之心態”的變項作分析，影響達到顯著的是現階級為工人，小資本家較傾向於保障貧困者之心態（相對於資本家），這與前述現階級為工人者較支持勞資抗爭，同樣站在弱勢的一方，顯得很一致；不過初階級為小資本家，與現工作地都市化程度者卻傾向於反對保障貧困者；認同於工人階級與職業的影響仍都未達顯著。

最後探討影響“壓抑大企業之心態”的變項，影響達到顯著者有：女性較缺壓抑大企業之心態；現工作地都市化程度越高，教育程度越高，壓抑之心態越強；而現為買賣服務工作人員則較缺壓抑心態（相對於專技管理佐理人員）。可能的原因是：大企業集中於都市，現工作地都市化程度越高，越能認識到大企業所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關秉寅與黃毅志，1995），或者都市人對於大企業可能帶來的問題較具敏感度（瞿海源，1994）；而教育程度越高，也越能認識到大企業的問題（關秉寅與黃毅志，1995）；現為買賣服務工作人員則有若要作“大生意”、“大企業”的願望，而不主張要壓抑大企業。認同於工人階級與職業的影響還是都未達顯著（註4）；在此現階級為工人則不會提高壓抑大企業之心態，而沒站在弱勢的一方。

五、結論與討論

在台灣地區，現職為相當於藍領工作者之勞動工人，以及過去具有勞動工人的職業階層經驗，如初職、父職為勞動工人者，

會提高親密網絡（最好的朋友或配偶）為工人，以及本人認同於工人階級之機會；如果一個人一直為處於勞動工人的不流動狀況，則很可能就會有最大的機會以工人為最好的朋友或配偶，認同於工人階級，這支持了流動（或不動）的經驗會影響親密網絡與階級認同的理論假設；然而親密網絡會影響到階級意識的假設卻得不到支持，現職為勞動工人，或具有勞動工人的職業階層經驗者對階級意識之影響，亦僅限於最低層次的工人階級認同，並不會從工人階級認同發展出屬於較高層次的抗爭性階級意識之“對於勞資抗爭之態度”，而不支持理論假設。

至於會影響到“對於勞資抗爭之態度”的因素主要是馬派的現階級位置，這以現階級為工人者與資本家的對抗最為明顯；然而過去具有工人的階級經驗者，並不會提高抗爭性意識，同是現為工人者，一直為工人者的抗爭性意識並不會比較強，並不支持了流動（或不動）的經驗會影響到階級意識的假設，而且位於馬派的工人階級位置也不會提高認同於工人階級之機會。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可作進一步的釐清：所謂的“工人”有兩個面向或兩種意義，這包括了職業為藍領工作者之“勞動”工人，與馬派現階級位置為非管理職務的“受雇”工人，這包含了許多白領受雇者；會發展出低層次之工人階級認同的主要是勞動工人，而會發展出高層次之勞資對抗意識的卻是“受雇”工人（註5）。

從上述“現職為勞動工人，或具有勞動工人職業經驗者，都會顯著地提高為認同於工人階級之機會”，與“馬派的工人階級位置並不會提高認同於工人階級之機會”之發現看來，台灣民衆界定“何者是工人階級”所根據的應是根據工作內容做區分的職業類別，而不是馬派所強調的是否有生產工具，是否雇用員工……等與

生產組織有關之權力；許多資本家、小資本家認同於工人階級，他們之中有很多人在小規模企業裡，亦要像工人般地辛勤工作當是重要的原因（黃毅志，1994；謝國雄，1989）。若依 Mann (1973) 對於階級意識所作的分析，先有階級認同在先，才會發展出抗爭性意識，然而台灣的勞動工人的職業位置固然會發展出傾向於認同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卻不會發展出較明顯的抗爭性意識，會發展出抗爭性意識的，反而是馬派的工人階級位置；何以傾向於認同工人階級的勞動工人沒發展出抗爭性意識？這有兩種可能的解釋：

(1) 目前的工人意識之發展尚未成熟，僅發展至工人認同，今後隨著階級意識之逐漸發展，仍可能會發展出明顯的勞資抗爭性意識。

(2) 勞動工人的職業位置並不容易發展出明顯的勞資抗爭性意識，會發展出明顯的抗爭性意識的是其它的客觀位置。

根據本研究“台灣的勞動工人並沒發展出較明顯的勞資抗爭性意識，發展出明顯的勞資抗爭性意識的，反而是馬派的工人階級位置”之發現看來，(2) 當較具說服力，這也支持了 Parkin (1979: 11-15) 所說的：職業分類不容易如馬派的階級分類般地顯現出“可能發生足以改變社會結構之集體對抗的界限”，其實是關連到剝削或被剝削的階級分類，而非職業，方能構成“自為階級之基礎”之論點；而由在生產關係上處於被剝削的位置之“受雇”工人發展出的抗爭意識。然而若依 Mann，居於馬派的“受雇”工人階級位置者，這包含了許多非管理職務的白領受雇員工，既然已發展出明顯的抗爭性意識，則必然已有階級認同發展在先，不過他們卻不傾向於認同工人階級，他們所認同的又是什麼？是否為“非管理職務的受雇員工”？台灣民衆對如此的階級位置又作如何的稱呼？認同者如何認識到被資本家剝削，並進一步發展出明

顯的抗爭性意識？而居於勞動工人的職業位置者已傾向於認同工人階級，並沒發展出明顯的勞資抗爭性意識，隨著勞動工人意識之發展，又會發展出怎樣的高層次階級意識？怎樣的抗爭性意識？是否會在文化消費上發展出與白領工作者進行對抗或競爭之意識？這些問題都有待於進一步之研究。

至於在邏輯上相當具有說服力的“親密網絡會影響到階級意識”的理論假設，則因為本研究發現所有的影響都未達顯著，而得不到支持，這與眾多國內外之研究發現相左 (Davis and Robinson, 1988; Hodge and Treiman, 1968; Baxter, 1994；黃毅志，1994)，在目前尚欠缺適當的本土研究與理論基礎得以用來解釋本研究發現的情況下，這個發現可能僅是一個“孤證”，這有可能是方法上的問題，如網絡涵蓋了許多面向與網絡成員 (Marsden, 1990)，很難藉著本研究所用的指標作適當測量，無法顯現出網絡的影響所致，尚不能斷然否定這個理論假設；如果往後的研究採用涵蓋了許多面向與網絡成員的多重指標作測量，還是無法顯現出網絡的影響，而必須否定這個理論假設，也就更有必要重新思考本土的社會網絡與階級形成理論！

註 釋

註 1：固然本研究所分析的“民國 81 年社會變遷社會階層組資料”，為一橫斷面 (cross-sectional) 資料，無法很清楚的根據“資料”分析結果來證實模型中各變項的因果順序，不過仍有“理論”基礎可以用來支持模型的因果順序，祇要藉著多變量分析來作適當的統計控制，並根據資料分析結果證實了模型中各變項的相關並不是虛假的 (spurious)，就有理由相信“何者為因，何者為果”；比如，根據文獻檢討中的理論基礎，可說明“社會流動（或不動）為因，親密網絡組成為果”，然而並沒有理論可說明“親密網絡組成為因，社會流動（或不動）為果”；

若依林南的理論 (Lin, 1982, 1994) 與相關研究 (Hsung and Hwang, 1992 ; 孫清山和黃毅志, 1994) , 會影響到社會流動 (果) 的, 當是“與本人的關係往往不是很親密的職業介紹人” (因), 而非親密網絡; 祇要能證實“社會流動 (或不動) 與親密網絡組成”的相關並不是虛假的, 就有理由相信“前者為因, 後者為果”。根據文獻檢討中的理論基礎, 同樣又可說明模型中“社會流動 (或不動) 與親密網絡組成為因, 階級意識為果”; 同樣又沒有適當的理論可說明相反的因果順序, 祇要能證實相關並不是虛假的, 也就有理由相信“前者為因, 後者為果”。

註 2 : 民 81 年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社會階層資料的教育測量原屬等級尺度, 為了使測量合乎迴歸分析的尺度設定, 本研究乃參考各級教育修業年數, 把各級教育程度轉換成教育年數。

註 3 : 本研究所要檢證理論所指出的“流動 (或不流動)”之影響, 指的是“如果一個人一直處於工人階層而不流動, 就會提高工人意識”的效果, 此即“不同時期所累加起來的 (additive) 工人階層經驗越多, 則工人階級意識”越強的效果; 由於理論所指出的影響是累加的, 而不涉及交互作用 (interaction), 依表 4 , 表 5 , 累加父親階層, 本人初階層, 現階層各項主效應 (main effects), 而對階級意識作解釋的累加模型 (additive model) 作分析就可以了。如果用 Duncan (1966) 的統計語詞嚴格來說, 必須涉及前後階層的交互作用, 才能說有流動的影響, 本研究的理論所預期的“流動”之影響, 由於沒涉及交互作用, 而僅是不同時期所累加起來的經驗之影響, 就不能說是“流動”之影響。不過若用一般的語詞來說, “一直處於工人階層而不流動, 就會提高工人階級意識”的效果, 涉及到不流動會提高階級意識的作用, 還是能說是流動 (或不流動) 會影響到階級意識, 這可說是另一種意義的“流動之影響”, 更何況有進一步的研究曾指出 Duncan 對“流動之影響”的界定過於狹隘, 其實並不一定要有交互作用, 才能說有存有“流動之影響” (Brody and McRae, 1987: 209-210) 。

對於以上本研究分析“流動 (或不流動)”之影響的方法, 可能有些細心的讀者還會提出下列的疑問: 何以不把父子兩代同一階級或職業者歸成一類, 初職 (或階級) 與現職 (或階級) 相同者歸成一類, 前者即代間不動者, 後者即代內不動者, 並比較這些不動者與流動者的階級意識之差別, 以分析“流動 (或不流動)”之影響?

如果依據這個方法作分析, 就必須考慮到即使同樣是代間不動者, 仍

有許多不動的型態，如 1. 父階級與子現階級均為資本家，子初階級為小資本家， 2. 父階級與子現階級均為資本家，不過子初階級為工人， 3. 父階級與子初現階級均為資本家， 4. 父職與子初現職均為勞動工人， 5. ……；即使同樣是代內不動者，也是有著許多不動的型態，如 1. 子初現階級均為小資本家，父階級為資本家， 2. 子初現階級均為小資本家，父階級為工人， 3. 子初現職均為勞動工人，父職為農……；依本研究的階級與職業分類，總共有 $40 (= 4 \times 4 \times 4 - 4 \times 3 \times 2)$ 種職業不流動的型態，而階級不流動的型態也是 40 種，種種不同的不流動型態有不同的意義，並可能帶來不同的階級意識，而有必要加以區分。至於流動者，也是有著種種不同的流動型態，如 1. 父階級資本家，子初階級小資本家，現階級工人， 2. 父職為農，子初職勞動工人，現職買賣工作……總共有 $24 (= 4 \times 3 \times 2)$ 種職業流動的型態，而階級流動的型態也是 24 種，種種不同的流動型態有不同的意義，並可能帶來不同的階級意識，也有必要加以區分；依此方法所作的繁複區分，不但會使迴歸或邏輯迴歸分析變得非常複雜，也會使屬於各類流動或不流動型態的樣本數變得很少，而難以進行統計推論。相對而言，本研究分析“流動（或不流動）”之影響的統計模型則較為簡潔，而且較容易研判“流動（或不流動）”之影響（可參表 4,5）。本研究的統計模型同時包括了父職、初職與現職（及階級），可同時（而非分開）處理代間不流動與代內不流動對於階級意識的影響；如果發現父職為勞動工人，初職為勞動工人，以及現職為勞動工人對於工人意識的影響均為正值，即可斷定“如果一個人一直為處於勞動工人的不流動狀況，就會有最大的機會認同於工人階級；不論是代間不流動或代內不流動，都會提高對工人階級之認同”，而能證實了流動或不動的階層經驗會影響階級意識的假設。這可用表 4 之式 (3) 作說明，父職、初職與現職均為勞動工人的的代間不流動者之工人認同，比對照組（即均為專技管理佐理人員者）高出 $2.02 (= .19 + .63 + 1.2)$ ，即父職、初職與現職為勞動工人的 b 值之和）；而父職為專技管理佐理人員，且初職與現職均為勞動工人的代內不流動者之工人認同，比對照組高出 $1.83 (= .63 + 1.2)$ ；根據式 (3)，這兩種不流動者與其它民衆相比，當有較強的工人認同；根據式 (3) 的 b 值，並可算出所有流動或不動型態者的工人認同之差距，而能很完整，很清楚地探討“流動（或不流動）對階級意識之影響”。

註 4：進一步的分析將表 5 的“認同於工人階級”剔除於迴歸模型，而保留

其它變項，以估計父職、初職或現職為勞動工人對四個依變項之總影響，仍顯示所有的影響都未達顯著（ $p > 0.05$ ）。

註5：本研究中所謂的馬派階級與職業為階層化的兩個不同向度（許嘉猷，1986:174-176; 1987:35-36），本研究的職業分類上之勞動工人通常稱為藍領工人，此即社會變遷調查所採用之行政院主計處分類中的“生產及有關工人、運輸設備操作工及體力工”，這並不包含“低層白領工作者（如佐理人員）”，也不包含“專業受雇者”（可參瞿海源，1992:359-374），在本研究所作的所有統計分析中，所採用的職業分類都應能有效地區分出藍領工人與低層白領工作者，或專業受雇者”。而會混淆“藍領工人與低層白領工作者，或專業受雇者”的是馬派階級中的工人階級，它所指的是“沒有生產工具，不能購買他人勞力，也不能控制他人勞力”之非管理職務的受雇者，它同時可包括藍領工人，以及低層白領工作者與專業受雇者中的非管理職務之受雇者（許嘉猷，1987:36），如非管理職務之受雇文書佐理員；然而本研究在所有探討“影響工人意識的因素”之統計分析中（見表1,4,5），都有把職業納入分析，還是能在“不混淆的情況下”，分析整體藍領勞動工人的階級認同與對抗意識。

參考書目

王振寰

- 1989 〈工人階級形成的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三、四期：147-174。

行政院主計處

- 1983 〈中華民國統計地區標準分類〉。

吳乃德

- 1992 〈階級認知與階級認同〉，中央研究院歐美所階級結構與階級意識比較研究研討會論文。

孫清山和黃毅志

- 1994 〈社會資源、文化資本與職業取得〉，《東海學報》，35:127-150。

- 1995a 〈教育、收入與社會資源和階級取得過程之關連〉，林松齡主

編，〈台灣社會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頁 151-182。

- 1995b 〈台灣階級結構：流動表與網絡表的分析〉，先於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第二次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國際研討會發表，後通過評審，收錄於變遷中的台灣社會，即將出版。

黃毅志

- 1994 〈台灣地區民衆主觀階級認同〉，〈東吳社會學報〉，第三期，頁 265-292。

許嘉猷

- 1986 〈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台北：三民書局。
1987 〈台灣的階級結構〉，〈中國社會學刊〉，第 11 期（春季），頁 25-60

謝國雄

- 1989 〈黑手變頭家—台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2):11-54。

瞿海源

- 1992 〈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調查計畫：第二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4 〈台灣社會問題的變化〉，伊慶春主編，〈台灣民衆的社會意向〉。頁 1-40，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關秉寅和黃毅志

- 1995 〈台灣社會階層信念之研究〉，先於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第二次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國際研討會發表，後通過評審，收錄於變遷中的台灣社會，即將出版。

Baxter, Janeen

- 1994 "Is Husband' Class Enough? Class Location and Class Identity in United States, Sweden, Norway, and Australi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220-235.

Blau, P.M. and O.D. Duncan

-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Brody, C. J. and J. A. McRae Jr.

- 1987 "Model for Estimating Effects of Origins, Destination, Mobility", *Social Forces* 66(1): 208-225.

Dahrendorf, R.

- 1959 *Class and Class-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is, N.J. and R.V. Robinson

- 1988 "Class Identification of Men and Women in 1970s and 1980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103-112.

Duncan, O.D.

- 1966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pp.51-97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Mobil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dited by Neil J. Smelser and Seymour M. Martin Lipset. Adilne.

Elster, J. (ed.)

- 1986 *Karl Marx: A Rea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

-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 & Row.

Goldthorpe, J.H., Catriona Llewellyn, and Clive Payne

- 1980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odge, R.W. and D. Treiman

- 1968 "Class Iden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3: 534-47

Hsung, Ray-May and Yih-Jih Hwang

- 1992 "Job Mobility in Taiwan: Job Search Methods and Contacts Statu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XII International Sunbelt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 Feb.13-17, 1992. San Diego, C.A., U.S.A.

Kelley, J. and M. D. R. Evans

- 1995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Six Western N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157-178.

Lenski, Gerhard E.

- 1966 *Power and Privilege*, New York: McGraw-Hill.

Lin, Nan

-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P.P131-146 in P. Marsden and Nan Lin(ed.)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Sage.

- 1994 "Action, Social Resources, an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Structure", *Advances in Group Processes* 11: 67-85.
- Lipset, S. M. and R. Bendix
1959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nn, M.
1973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among the Western Working Class*. London: Macmillan.
- Marsden, P. V.
1990 "Network Data and Measure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 435-463.
- Parkin, F.
1979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orokin, P.A.
1927 *Social and Cultural Mobi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SPSS INC.
1990 *SPSS/PC+ Advanced Statistics 4.0* Chicago: SPSS INC.
- Vanneman, R.D.
1980 "U.S. and British Perception of Cla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4): 769-789.
-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onnacott R. J. and Wonnacott T. H.
1979 *Econometrics*. 臺北：雙葉書局。
- Wright, E.O.
1979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right, E.O. and L.Perrone
1977 "Marxist Class Categori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 32-55.

Social Mobility, Social Network, and 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

Yih-Jyh HWANG

(ABSTRACT)

Many theorists have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obility on class consciousness since Marx. Although many researches have analyzed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eparately, studies i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are few. Based on the data of Social Change Data in Taiwan 1992, this study uses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to analys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obility on working class identities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working class-capital conflict. Then it explores the intervening role of social network i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obility on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In Taiwan, the worker whose current occupation is blue-collar or he has ever belonged to blue-collar strata (e.g., his first occupation or his father occupation) tends to show that his intimate network (the best friend or spouse) is composed of blue-collar workers and he identifies with working class. If one always belongs to blue-collar worker, he is more likely to display that his intimate network is composed of blue-collar workers and he identifies with working class. However, the intimate network does not influence class consciousness. The workers whose current occupation are blue-collar or they have ever belonged to blue-collar strata do not develop the consciousness of working class-capital conflict. The workers who are most

likely to develop the consciousness of working class-capital are nonmanagerial employees. According Marxism, the nonmanagerial employees belong to working class, which includes many employed white-collar workers.

keywords: social mobility, social network, 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